

新侨乡 新移民 闽籍华侨华人

詹冠群 / 主编

历史与现实



海峡文艺出版社

詹冠群 / 主编

历史与 现实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实与历史:新侨乡·新移民·闽籍华人/詹冠群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7.12
ISBN 978-7-80719-214-5

I. 历… II. 詹… III. ①华侨—历史—研究—福建省 ②华人—历史—研究—福建省
IV. G6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5982 号

现实与历史

新侨乡·新移民·闽籍华人

作者:詹冠群

责任编辑:冯 卫

出版发行:海峡文艺出版社

社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350001

发行部电话:0591-87536724

印刷:福建省金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350012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字数:300 千字

印张:15

版次: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19-214-5

定价: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苦竹村坪熊墩



闽清县坂东镇六叶祠



福清市新厝镇江兜村



福州市马尾区亭江镇的一个幼儿园。约有80%以上的学童是“小美国人”。



马来西亚主要的华文日报

詹冠群教授（前排右二）、夫人林永青（前排右三）和学生们在一起。前排左起：孙易红、王立芳、程鹰。后排左起：孟庆梓、韩玲玲、陈日升、黄雷、俞黎媛、肖方峥、李莉、郑志锋。



詹冠群教授（右二）与学生肖方峥（右一）、陈建玲（左一）在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调查时，参观华人神庙青山岩。左二为沙捞越福建公会会长周启明博士。

现实与历史

——新侨乡·新移民·闽籍华人

詹冠群 主编

序

现实与历史紧密相连，在生生不息的传承中，历史的积淀和现实的承载生动地体现在福建的新侨乡、新移民和闽籍华人之间。本书试图探究此中个性，感受时代脉搏。感谢读者诸君陪同我们徜徉于这段现实与历史。

本书共由九个部分内容组成，除导论外，其余是在我的研究生硕士论文的基础上精减修订而成。他们的方向都是专门史之下的华侨华人研究，因此，论文选题相对集中，研究方法颇为相同。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选题均围绕闽籍华侨华人研究的若干专题，既有近代的老华侨，也有现代的新移民；既有侨乡的文化变迁，又有海外华人社会的进化，涵盖了侨史学界当今诸多热点问题。

第二，以深入的田野调查作为有关问题论述的基础，构成本书最大特色。有关新侨乡、新移民研究的三位作者，分别在建阳市的苦竹坪、福清市的江兜村和福州市马尾的亭江镇，进行了长时间的田野调查。他们不但取得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而且对侨乡的认识经历了从感性到理性的升华。关于闽清六叶祠问题研究的作者不但在当地进行调查，而且访问了蜚声海内外的马来西亚“新福州”诗巫。关于华人参政研究和马来西亚华文报业问题研究的作者，也访问了马来西亚的古晋和诗巫。他们三人分别在华人社会里生活了三个月，不但阅读、复印了大量原始材料，而且亲身感受了闽籍华人社会的优良传统和现实状况。研究近代新加坡华人神庙和马来西亚华教名人沈慕羽的两位作者，虽然没有出国访问，但是导师出访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时，专程访问了新加坡的天福宫、宗乡总会、马来西亚董教总以及沈慕羽本人，为她们取得许多宝贵资料。总之，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使得本书内容丰富、翔实、可靠。

第三，本书九个部分内容，既前后连贯，又独立成篇。导论为全书铺垫，接着是新侨乡、新移民的论述，继而以血缘、地缘展开，再谈华文教育与华文报业，最后以华人参政结尾，力求一气呵成。

文中所述，多数未见前人专题论及，姑妄称之为原创，虽仍有稚气，且疏漏难免，但也不失纯朴的闪光点。孰优孰劣，尚待方家和读者诸君评判。

这里，我不能不说到本书编辑初衷。常言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学校也是如此，学生一茬茬地来，又一茬茬地走。当看着自己的学生像高飞的大雁般离去，心中几许欣慰，又几许惆怅。于是，我萌生想法：如果能把他们硕士生三年的成果整理结集出版，既可以为华侨华人研究提供资料和线索，又可为他们留下前进的印记，鞭策新的冲刺，可能是个好主意。这一想法在许多师友的支持下，终于付诸实施。

本书写作与编辑过程中，得到福建师范大学副校长汪征鲁教授、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院长林金水教授、林国平教授、海峡文艺出版社社长何强先生的热情帮助和指导。编辑冯卫先生认真细致审读本书，提出了宝贵意见。本书承蒙刘会干海外华人研究基金资助出版。为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参与本书写作的作者如下：

詹冠群：导论 闽人出国

程 鹰：内地海外新移民迁移网络构建与运行

孟庆梓：海外新移民与当代农村社会变迁

陈日升：福建亭江的“小美国人”：一个跨国寄养的新移民群体

陈建玲：超越时空的血亲维系

王立芳：近代新加坡的神庙与华侨社会

孙易红：沈慕羽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

肖方崢：变化中的马来西亚华文报业

郑志锋：融入主流社会的参政之路

谨此为序。

詹冠群于阳光新村

2007 年 10 月

目 录

序	(1)
导论 闽人出国	(1)
初始阶段：唐至明代中叶——发展阶段：明中叶至鸦片战争前夕——高潮阶段：鸦片战争至建国前夕——新时期：建国后至今	
一 内地海外新移民迁移网络构建与运行	(13)
——以福建建阳市苦竹坪村为例	
海外新移民产生与发展——海外新移民网络的形成及其运作——海外新移民对山区农村社会的影响	
二 海外新移民与当代农村社会变迁	(38)
——关于福建福清市江兜村的调查	
江兜村基础条件概述——农村社会变迁的新动力——海外新移民与农村经济结构变动——海外新移民与农村文化形态变迁	
三 福建亭江的“小美国人”	(65)
——一个跨国寄养的新移民子女群体	
亭江人之移民美国——亭江美国小公民寄养现象的产生与发展——美国小公民在亭江的生活与学习——美国小公民对侨乡亭江的影响	
四 超越时空的血亲维系	(90)
——福建闽清侨乡坂东虎丘黄氏宗族研究	
坂东虎丘黄氏宗族的形成发展及现状——侨乡虎丘黄氏宗族的表现形式及组织结构——侨乡虎丘黄氏的宗族活动及其特点——侨乡虎丘黄氏宗族的功能	
五 近代新加坡的神庙与华侨社会	(117)
从“帮”看近代新加坡华人神庙——华人神庙与新加坡秘密会社的关联——作为地缘性社团雏形的新加坡华人神庙——近代新加坡华人神庙对华侨教育的贡献——近代新加坡华人对中华文化的弘扬	

六 沈慕羽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 (149)

执教杏坛 硕果累累——捍卫华教 鞠躬尽瘁——华教领袖的政治影响

七 变化中的马来西亚华文报业…………… (174)

马来西亚华文报业的现状——马来西亚华文报的特点和社会功能——马来西亚华文报与华人的关系——马来西亚华文报业发展的困境

八 融入主流社会的参政之路…………… (200)

——马来西亚沙撈越华人政治演变

沙撈越与早期华人——战前沙撈越华人的政治心理——沙撈越华人政治意识的觉醒——政党政治的开始与沙撈越的独立——人联党影响下的沙撈越华人社会与沙撈越加入大马——加入大马后的沙撈越华人社会与人联党——民主行动党进入沙州与沙撈越华人社会——沙撈越华人选民的日渐成熟——九十年代沙华政治的新变化

导论 闽人出国

举凡论述出国之始的著作，无不以《后汉书·东夷列传》中所载有关史料为最早，即“会稽东冶县人有人海行遭风，流移至澶州者”。东冶县即现在的福州，时属会稽。澶州，有关学者认为就是菲律宾。这也是至今所见关于闽人出国的最早记录。

自古以来福建先人具有乘槎出海的能力，即所谓“习于水斗，便于用舟”。闽人出洋谋生的历史悠久。以时间来划分，闽人出国史可分为初始、发展，高潮与新时期四个阶段。

初始阶段：唐至明代中叶

唐代至明中叶，是闽人出国的初始阶段。

唐代前后，福建沿海人口不多，出国者很少。不过也有些零星记录。菲律宾礼智省的马亚辛，曾发现唐高宗显庆六年（661年）的郑国希之墓，碑载郑氏原籍南安^①。

据马素提《黄金牧地》说，933年他航海经过苏门达腊时，看见许多中国人在此耕种，巴林邦（今巨港）特别多，其中包括许多漳州人。他们为避黄巢之乱而来到这里^②。

后晋开运元年（944年），留从效出任晋江王，积极开展海外贸易，陶瓷铜铁泛于番国。随着海外交通和贸易的发展，泉州一带出国经商的人逐渐增多^③。

北宋时，泉州设置了市舶司，政府鼓励海外贸易。闽南地区到南洋经商的人很多。赵汝适的《诸蕃志》记述了泉州港至占城（越南南部）、真腊（柬埔寨）、凌牙门（新加坡）、阁婆（爪哇）等地的航行时间，以及福建商人与东南亚诸国经商的盛况。

南宋经济重心南移，促进了福建对外贸易的繁荣，带动了福建沿海造船业的长足发展。当时科技的进步，如指南针等使用，提高了船舶航海能力。但是，在发展的同时，沿海地区人稠地狭、耕地不足的矛盾日益严重。因此，福建沿海更多居民或经商、或受雇于他人，频繁往返于东南亚各港口之间。他们中既有等待季风返航而“住冬”的“行商”，也有因经商需要而留居“住蕃”^④的“住商”。这些人成为早期华侨的先驱者。

①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华侨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② 漳州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编：《漳州华侨志》，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页。

③ 吴泰主编：《晋江华侨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

④ “住冬”语见赵汝适的《诸蕃志》“南暹国”条，“泉舶四十余日到兰里（今苏门达腊西北）住冬，至次年再发，一月始达。”“住蕃”语见宋代朱或《萍洲可谈》卷2，“住蕃虽十年不归”。

宋末元初，文天祥曾在漳州一带收集残部，有许多当地人被招募。元兵进入闽南之后，这些人在闽粤沿海抗击，失败后逃往南洋，大多侨居在占城、爪哇、苏门达腊等地。泉州籍的许多不愿臣服元朝统治的义士和难民逃居菲律宾、爪哇、文莱等地，终老异乡。福州地区也有一些义士逃往占城、交趾。这些人则属于政治移民。

宋代移居东南亚的福建人，多数居住在交通比较便捷的苏门答腊、爪哇、马来半岛等地，以后逐步扩展到菲律宾群岛、北婆罗洲等地。

元政权统一中国后，重视对外贸易。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设市舶都转运司于杭、泉二州。泉州一度上升为“行省”，泉州港为世界大港口之一，海外贸易空前繁荣，出洋人数也随之增加。

元代先后九次渡海向外用兵，有从泉州港启程的，但均损兵折将，无功而返，不少遗卒留居当地。如在爪哇勾栏山，“有病卒百余人留山中，今唐人与番人丛杂而居之”^①。曾经随郑和出洋的巩珍在《西洋番国志》中说，爪哇东部的“杜坂”，“此地约千余家，中国广东及漳州人多逃居于此”。马欢的《瀛涯胜览》也有类似记载。这说明当时已有大批的福建人定居爪哇。

明朝初年，朱元璋厉行“海禁”，撤消泉州、明州等处市舶司，禁止私商出海。这导致海外贸易急剧萎缩，但是闽南沿海冒死出海经商者仍为数不少，正如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所说：“海者，闽人之田也”，因而“有禁洋之明，未能尽禁洋之实”。

到了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恢复海外贸易，发展对外关系，以扬威国外。最著名的就是郑和七次下西洋。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二十九年间，郑和先后七次率领庞大的船队，经太平洋、印度洋，访问了东南亚、印度、波斯以及非洲东部等地的三十多个国家，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加强了中国与南洋诸国的关系，也促使大批福建商人、水手、农民、小手工业者，沿着这条路线到东南亚各地经商和谋生。

福建沿海地区与郑和下西洋有密切关系。福建的福州、泉州、漳州是当时重要的造船之地。出洋之前，郑和的船队多次驻扎在福州长乐太平港，修造船舶，招募水手，祭祀海神，等候季风。大批富有航海经验和具有各种技能的闽籍人士被郑和招聘，跟随出使。其中有些人在到达爪哇的巴达维亚、旧港，以及文莱、马六甲等地后，留居当地。

郑和所率船队到过吕宋、苏禄等地之后，闽南人移居菲律宾群岛的逐渐增多。《明史》载：“吕宋居南海中，去漳州甚近，……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至者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②。郑和下西洋在客观上为侨居者创造了良好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对闽人迁移东南亚影响深远。

在初始阶段，福建出国人员大多数是从事贸易的商人和谋生的手工业者、农民等，还有不少人或因政治原因而遁逸，或因躲避军役、躲避战乱而逃居。这一阶段移民带有很大的不稳定性，他们比较频繁地往返于国内和南洋之间。

① 汪大渊：《岛夷志略》，“勾栏山”条。

② 《明史·外国四·吕宋》卷323。

从闽籍华侨数量看,初始阶段估计总数有数万人。整个东南亚地区华侨总数应不少于十万人,其中泉州籍华侨人数约有四五万人^①。明嘉靖年间,吕宋的中国商贩达数万人,其中漳州籍海商占十之八九^②。

从分布地区看,初始阶段的闽籍华侨主要居住在交通比较便捷的越南、马来亚、印尼的爪哇与苏门达腊以及菲律宾、文莱等地,并开始逐渐形成一个个小规模华侨社会群体。

发展阶段:明中叶至鸦片战争前夕

从16世纪中叶的明隆庆元年(1567)至鸦片战争爆发前夕,是闽籍华侨出国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国内外社会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对闽人出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一,自1511年葡萄牙殖民者占领马六甲后,欧洲列强接踵而来,东南亚相继成为他们的殖民地。殖民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开发南洋各埠,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于是鼓励与招揽华侨迁入。

第二,福建沿海地区商品经济发展,如漳州、德化一些地方开始出现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要求对外自由贸易。与此同时,福建人口不断增长,土地兼并激烈,更多农民失去土地。明末清初,战争不断,社会动荡,灾荒频仍。据统计,福建从1068年到1911年发生饥荒888次,其中,漳州、泉州、莆田、仙游等17县共发生饥荒321次,平均不到三年就有一次^③。出国成为福建沿海地区破产农民的重要谋生之路。

第三,封建政府“海禁”与“开禁”的政策交相进行。明隆庆之前厉行“海禁”,隆庆元年(1567)开放海禁后,仍有诸多限制。清初的1655年,全面实行海禁;1660年,“迁沿海三十里于界内”^④。闽人正常出国的途径几乎完全被堵塞。但是,生活无着的沿海闽人依然有众多的人冒险出洋,民间海外贸易在夹缝中曲折地发展。一旦“开禁”,福建沿海的对外贸易则进一步扩大。这又促进了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更促使越来越多的闽人移居南洋各地。

明中叶至明末,闽人出国主要到菲律宾、印尼以及马来亚一带。那时,菲律宾的农业经济还很落后,1585年和1590年,西班牙殖民者曾两次派人到闽粤招收中国农民赴菲耕种^⑤。明万历年间,旅居菲律宾的长乐籍人陈振龙将番薯种带回福州试种成功,为解决福建粮食不足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17~19世纪,闽南地区移居菲律宾的最多。据雷戈里奥·弗·赛义德的《菲律宾共和国——历史·政府与文明》统计,1571年西班牙占领马尼拉时,当地仅150名华侨,1593年增至一万名,1603年菲律宾群岛达三万多名。1747年,已增至四万人。

① 泉州市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编:《泉州华侨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② 漳州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编:《漳州华侨志》,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页。

③ 陈达:《闽粤华侨与闽粤社会》,第48—50页。

④ 魏源:《圣武记》卷8,《东南靖海记》。

⑤ 陈荆和:《十六世纪之菲律宾华侨》,第62页。

这一时期，马六甲也有闽人定居。1613年伊里狄绘制的满拉甲（马六甲）城市图，有中国村、漳州门和中国溪等地名。漳州门应该是漳州籍华侨较为集中的居住地。1641年，荷兰人占领马六甲，委任漳州籍华商郑芳扬为甲必丹，招引华侨前来定居，利用华侨发展当地的经济。

在印尼，闽籍华侨占多数，闽籍华商财力也较为充足，因此殖民当局经常委任闽人出任华人官职。1619年10月，荷殖民当局指派的第一任甲必丹是祖籍福建同安的华商苏鸣岗，负责管理巴城有关华侨事务。三宝垄从17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十八名甲必丹全部是闽人。1649年，福建龙溪人颜二被委为巴达维亚甲必丹。

17世纪初，每年从漳州月港开往巴达维亚的商船大约四五艘，每艘可载客数百名。泉州港也常开往巴城的商船，1625年~1627年的三年间，就有1280人到达巴城，回国的不到三分之一^①。

明代时，马来半岛的北大年为暹罗属地。据张燮的《东西洋考》记载，嘉靖末年，中国沿海的海盗逃奔此地，聚至2000人^②。大部分是闽、粤、浙人。

明朝末年，东南亚华侨以闽人最多，广东人其次。菲律宾的华侨几乎都是福建人，巴城和北大年的华侨也以闽人为主。缅甸北部的华商中，福建人也相当多。据估计，闽人则约占南洋华侨总数的70%~80%。从职业上说，以商贩为主，其次是各类工匠。

清初至鸦片战争前夕，闽人继续来到闽籍华侨传统侨居地印尼、菲律宾以及马来半岛的马六甲、吉兰丹、柔佛等地。后又陆续扩展到槟榔屿、森美兰、彭亨、雪兰莪。婆罗洲的文莱、沙捞越以及暹罗（泰国）、柬埔寨、越南，也有许多经商的闽籍华侨。

1683年，清军攻占台湾，跟随郑成功的闽籍官兵大批逃往南洋，其中有数百人逃到菲律宾定居。1757年，福建永春人陈臣留到马六甲谋生。据说他擅长中草药治病，曾治愈苏丹妻子的绝症，苏丹便赐予他大片的土地。于是，陈臣留回国带了数百名亲友、同乡来马六甲从事种植^③。

柔佛苏丹推行港主制，从1833年到1917年，一共开港138个，种植胡椒、甘蜜。取得开港证最多的是潮州人，其次是福建人。种植园的工人中也有很多是福建人^④。

1720年，巴达维亚城内外的华侨已逾十万人。他们多数是闽南沿海迁去的小商、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在当地种植水稻，栽种并收购胡椒，种蔗榨糖，酿酒或经商。

1819年1月28日，英国殖民者莱佛士登上新加坡岛时，岛上只有150人，其中华侨30人。到了1820年8月，增加到1500人，其中大部分是华侨。1821年2月，厦门港首次直航新加坡成功。此后，经常有船从福建来。早期的新加坡闽籍移民主要是经商。1824年，新加坡沦为英国殖民地，并辟为自由港，允许商人自由买卖。因此，不少闽籍侨商从马六甲移居新加坡。如祖籍漳州海澄的陈笃生（1789—1850），出生在马

① 科尔哈斯（Collihars）编：《官方文件》卷1，1628年2月20日信，第92页。

② 张燮：《东西洋考》卷2，吉兰丹条。

③ 永春《留安刘氏族谱》。

④ 彭家礼：《英属马来亚的开发》，1983年商务版，第25页。

六甲、祖籍永春的陈金声(1805—1864),祖籍漳州漳浦的薛佛记(1793—1847),祖籍泉州的蔡沧浪(1788—1838),等等。同时,英国殖民者为了开发新加坡,不惜通过人贩子从马六甲以及闽粤等地,诱骗大批契约劳工,参加修建港口、船坞以及各种市政工程。据不完全统计,在19世纪30年代,仅闽粤沿海每年就有800至2000名劳工来到新加坡^①。

据史籍的不完全统计,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夕,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华侨总数已达150万人以上。暹罗的华侨近百万,闽人约占20—25%,主要集中曼谷。在曼谷的华侨中,闽人约占60%,约20多万人。在马来半岛各土邦内的商贩以闽人为主。英海峡殖民地(槟榔屿、马六甲、新加坡)的华侨以闽人居多,约占50%。爪哇华侨中的闽籍仍为多数,约占总数的70%。菲律宾的华侨绝大部分是闽人,占90%以上。越南、缅甸也都有相当数量的华侨。到了鸦片战争前夕,暹罗华侨数量90多万人,占东南亚华侨总数的60%。其中,粤人约90万人(潮州人约占50人),闽人约52万人,其余是云南、广西、浙江等籍。从职业看,这时从事种植业的最多,约占40%;商贩为第二,约占33%;矿工约占20%;其他职业约为7%^②。

发展阶段的特点是,东南亚地区的闽籍华侨不仅人数激增,而且分布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他们大多数是自由移民,一般聚居在经济较发达、交通较便利的地方。这时,也开始出现被殖民者招募或掳掠的闽籍劳工。闽籍华侨从事的职业逐渐趋向多样化。

在闽籍华侨比较集中的居住区,他们仍保持着原有的方言、生活方式、民族传统和文化习俗。随着闽籍华侨数量的不断增加,他们开始逐步形成了以同乡、同族为维系纽带的华侨社会群体,成为后来东南亚各国“福建帮”同乡社团组织的基础。

地缘性社团即以地缘为纽带构成的组织,也有以方言区为单位组成,是闽籍华侨社会的重要基石。闽籍地缘性社团发端于地缘性华人神庙。闽人素有敬神祈福的习俗,所以福建的各类庙宇繁多。闽籍华侨离乡背井来到异国谋生,敬神和祈求神灵保佑成为他们重要的精神依托。因此,他们建立了各类神庙。

1673年,马六甲的福建漳州籍华人甲必丹郑芳阳和李为经创建了敬奉观音的庙宇“青云亭”,成为当地闽籍华侨共敬神灵、联络感情的聚合之地,也是甲必丹的办公场所。这是马六甲以民间宗教为纽带的地缘性社团雏形。

1824年,英国以印尼苏岛明古连(Bencoolen)与荷兰换取马六甲。英人接管马六甲后,即废除甲必丹制度。马六甲华人社会以青云亭亭主来取代甲必丹的领导地位。亭主制度实行至1915年才废除,历时91年,共有6位亭主,均为闽南人。

1800年,槟榔屿闽籍华侨和粤籍华侨联合创建“广福宫”,敬奉观音,成了后来的跨省地缘性社团的前身^③。

1828年,新加坡闽籍侨商兴建恒山亭,作为福建同乡的联谊之所。薛佛记任大董

① 福建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福建省志·华侨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3页。

② 吴凤斌主编:《东南亚华侨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9页。

③ 林水椽、骆静山:《马来西亚华人史》,1984年版,第172—173页。